

目 录

中文版序	1
导论	1
第一章 大战与大危机：中、英、法与“以工代兵”计划	10
中国的危机	10
法国的回应	16
英国终于转向中国	23
新世界中的新中国：中国政府之看得见的手	31
第二章 英法招工与华工赴欧的奥德赛之旅	37
招工合同：责任与推诿	37
在华招工：竞争与摩擦	41
人数与工种	47
开启奥德赛之旅	51
第三章 被掩盖的历史：隐秘的加拿大之旅	55
运输与旅途	56
危险的赴法之旅	60
对加拿大运输计划的保密	63
加拿大人对华工的歧视	72
第四章 工作	80
工作环境和管理	81
华工的工作	87

2 一战中的华工

牺牲和英雄行为	94
战争的余波	102
第五章 待遇与认知	104
认知	105
沟通问题	110
以惩罚为纪律	115
英国人与法国人的区别	121
停战和回国	124
第六章 在陌生的世界里:生活在欧洲的中国人	128
服装、外貌和心情	129
生活经历	137
娱乐、两性与浪漫	148
第七章 美国士兵与中国劳工	156
美国呼唤支援,于是中国人来了	156
美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的麻烦	160
缺少称职官员,缺乏妥善管理	166
美国人与华工之间的问题	172
第八章 基督教青年会与华工	177
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	178
基督教青年会提供的帮助	180
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人员及华工服务	187
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内容	191
第九章 寓教于学:学生亦师,师亦学生	203
老师亦学生	204
华工亦老师	213
五四运动中的师生联合	218

会平等一员策略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中国政府不想因为公开这一计划而引发日本等其他列强的警觉和猜疑。作为一个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弱国，中国不具备任何冒犯德国与日本这样的强国的能力。这种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中国在一战期间处处谨小慎微的表现。此后，由于派遣华工计划并没有实现预期中的重要目标，中国政府也就失去了告知人们整个事件真相的兴趣。尽管依照官方的说法，英法两国招募华工完全是私人的商业行为，与中国政府并无瓜葛，但是很明显，劳工计划就是由中国政府精心设计并推动的。中国政府虽然身处幕后，但实际上通过多种方式对整个华工招募计划施加了重要影响。

中国政府决定派遣华工赴欧支援协约国作战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壮举。明清两朝都严厉禁止中国人出洋，那些违禁者甚至会被当政者处以极刑。^①1712年——那时已经有许多华人移居海外——清政府在一份诏书中宣布：“凡久居海外者必处以死刑，而且要由当地长官遣送回国，就地正法。”乾隆皇帝称海外华人是“天朝弃民”。如果华侨在国外遇到麻烦、遭受迫害，他们将不受天朝保护。^②这一官方法规直到1893年才被清政府最终废除。^③

明清时期的禁止移民政策是中华帝国综合征的体现，也是当时中国社会闭关锁国观念的反映。而到了19世纪晚期，中国不但逐渐摒弃了保守的闭关锁国思想，而且开始渴望加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西方世界不再是邪恶之地，而是中国人学习的榜样；出国成为一种特殊的荣耀。其结果是海外华人的地位迅速提升。1912年，中华民国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其中的《临时约法》和《国会组织法》赋予了海外华人合法参与国内政治的权利。1916年，当华工启程远赴法国之际，北京政府的农商部和外交部共同审核制定了一项旨在保护这些海外华人的新法令^④，这项新法令很快获得了通过。随着大量华工被派到欧洲援战，北京政府国务院还在1917年专门设立了侨工事务局。^⑤北京政府在1915年提出

① 有关海外华人的研究，参见：Wang Gun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该书中文版可参见：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中国与海外华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译者注）

② 引自 Yen Ching-huang, *Coolies and Mandarins: China's Prote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during the Late Ching Period (1851—1911)*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0—22。[该书中文版参见（澳）颜清湟著，粟明鲜、贺跃夫译：《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一八五一——九一一年：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年版。——译者注]

③ 该政策与鸦片战争后清廷签订的许多条约相冲突，因为上述条约允许外国招募华人到海外工作。

④ 参见《外交部收农商部咨》，1916年10月25日；《外交部发农商部咨》，1916年11月4日；《外交部收农商部咨》，1916年11月17日，引自《欧战华工史料》，第12—14、16页。

⑤ 有关北京政府的海外华人政策的详细分析，参见蒋顺兴、杜裕根：《论北洋政府的侨务政策》，《民国档案》1993年第4期，第68—72页。

的备忘录后,将其转发给了农商部,要求农商部与外交部相互合作,将这些建议付诸实施。^①

为了确保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华工权益得到切实保护,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法国政府严格遵守它与惠民公司之间的协定。中国政府特别强调,法国政府应当承诺华工将不会被用于直接的军事行动(协定第一款)。中国政府还要求法国政府保证:允许中国派外交官或领事前往法国驻扎视察华工在法国工厂里的工作条件和各项待遇(协定第十四款);法国政府必须保证赴法华工享有与法国公民同等的地位与同样的自由。法国政府与华工的雇主应当保证,华工不会受到其他工人的虐待(协定第十五款)。^②直到法国政府同意这些条款之后,中国政府才批准了陶履德招工团与惠民公司之间的招工协定。^③

中国政府坚持要求法国政府对协定内容作出书面保证无疑是精明之举。这些书面保证一方面可以作为驳斥德国抗议中国违反中立条约的依据,同时也保护了赴法华工的安全和利益。德国政府就华工赴法曾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但是中国政府每次都以英法招募华工是私营机构而非军事机构所安排的活动为由驳回。^④法国政府作出的华工不会被用于军事行动的书面保证,也使得德国政府很难进一步找中国政府的麻烦。^⑤德国的抗议准确地指出协约国的实力将因华工的支援而得到加强。德国人争辩说,在华工每增加一人就意味着他们的敌人新增一名士兵。^⑥德国的外交官们因而试图阻止华工招募工作。1917年2月2日,德国驻济南领事在一封给山东省政府的信中说,他已经“得到可靠消息”,有英国传教士正在山东招募华工,他要求当地政府“严格阻止所有诸如此类的行为”。^⑦但是德国人的举动似乎也仅限于此。北京政府秘密通知山东省政府并授以应对之策。在给山东的电文中,北京政府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华工招募工作的幕后支持者,山东省政府应当对此进行协助,因为“以工代兵”计划是宏伟的国家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⑧

具有马基雅维利式精妙讽刺的是,中国政府一方面对德国坚称法英在中国

① 《准法公使函商约束陆外华工办法六条请转令各商会审慎办理文》,《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1917年3月,第3期。

② 《欧战华工史料》,第195页。

③ 同上书,第196页。

④ 同上书,第8—11、15、17页。

⑤ 同上书,第199、200、207、209、210、213、200、225、232页。

⑥ 同上书,第246页。

⑦ Secret order addressed to the Magistrate of the Lin Yi district, NA, Kew, FO 228/2893.

⑧ 《外交部发沿江沿海东三省各督军省长密函》,1917年1月10日,见《欧战华工史料》,第20页。

候，无论早晚昼夜，他都会对后者说这句话。当利文斯敦回应时，他会咧开嘴笑，露出一排整洁漂亮的牙齿。

根据利文斯敦的记述，在横跨加拿大的旅途中，大约发生过两三次因为机车故障而需要更换火车的情况，每当这时，车内如同囚徒般的华工们就得捆起行李列队下车。有一次，华工们被允许换乘一等车厢，这显然是因为在那个交接点一等车厢是唯一空着的车厢。一等车厢的坐席全部都用丝绒包着，地上铺着地毯。为了试验这些软坐席的弹力，并感受它们的豪华，华工们站在上面不停地蹦跳。一位小伙子不小心将烟灰弹在地毯上，立刻双膝跪地，小心翼翼地将它们都扫到自己的手上。华工们被禁止走到自己所在车厢之外的任何其他车厢，也不许在任何车站下车到月台上去。利文斯敦在日记中写道，一名曾经陪伴着大多数华工营横跨过北美大陆的军官说，这些华工是他所见过的最守规矩、最优秀的一群人。到了哈利法克斯，在军官的指挥下，所有的华工带着各自的装备和行李迅速依次排队，秩序井然地下车了。他们为再次脚踩坚实的土地而高兴地呼喊，军官们则在他们通过时依次检查他们的号牌。有六个病号被留了下来；他们被停在火车旁边的一辆救护车送走。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掉队，使他们中的一两个人哭了起来。

在前往欧洲的海上航程中，船上每一寸可供利用的空间都被利用上了。二等舱、吸烟室和餐厅里都塞满了华工。晚上，他们就把桌面或蒸汽盘管当作床，更有甚者面对面坐在扶手椅上，蜷成一团裹在毛毯里和衣而睡。他们在椅子上的睡姿可笑而千奇百怪。利文斯敦不明白他们这样怎么能睡得着。有天晚上，每人配发了一个吊床，然而不少华工却在仓促之间将床装反了。大多数华工都不喜欢吊床，因为他们在家里睡惯了硬板床。晚上睡觉前，华工们常常都要先在舱底举行一场小型戏剧表演。因为看的人太多了，以至于空气变得混浊难闻。只要利文斯敦与他的军官同僚们露面，华工们就让他们坐在前排欣赏，通常后者都会答应前者的请求。紧接着，在一二位乐师的伴奏下，或者有时在一群普通华工的敲锣打鼓、吹笛奏乐之下，利文斯敦与他的同僚们就会听到演唱者的正式开唱。演唱者会诉说一个很长的故事，据利文斯敦揣测，情节似乎是关于一个绿林强盗或海盗与一位皇帝的妻子私奔的故事；表演者边走边唱，并像中国舞台上的专业演员一样，不时舞动胳膊和双手，脸上做出各种扮相和表情。观众们聚精会神地聆听，沉浸其中，但也有不少人会注意观察人群中的白人军官，看他们是否也喜欢这个表演。每隔一会，利文斯敦和他的同事就会说：“很好，很好！”这时华工们的脸上都会露出笑容。

日,在一份提交给渥太华军事总部人事行政参谋主任的备忘录中,加拿大西区的监察长(Inspector General for western Canada)约翰·休斯(John Hughes)写道:

尽管提供铁路运输以确保护送华工横穿加拿大国土的工作由我全权负责,但是我既未收到总部关于轮船抵达温哥华的消息,也没有收到负责押运列车的卫兵何时出发的通知。尽管我已竭尽全力处处配合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官员们,但是他们却并未以同样的合作态度对待我。^①

然而,即便存在种种问题,加拿大毕竟成功地完成了这项前所未有的跨大陆运输计划(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理应受到称赞。

对加拿大运输计划的保密

64

欧战刚一爆发,加拿大支持并紧跟英国的步伐通过了《战争措施法案》(*the War Measures Act*),该法案授权政府可以对新闻舆论加以管制。该法案催生了一个新的名为加拿大首席新闻检察官(*the Chief Press Censor of Canada*)办公室的机构。曾是一名记者兼编辑的欧内斯特·钱伯斯上校(Ernest Chambers)被任命为首任首席新闻检察官。当英国政府要求加拿大政府对从中国运送华工赴欧一事保密时,加拿大总理罗伯特·博登(Robert Borden)表示同意。

为了确保无人知晓加拿大为了英国而将华工经由加拿大转运至欧洲,钱伯斯办公室殚精竭虑并且发挥了丰富的创造才能。为了保密,加拿大的华人社区被监控,华人的很多通信都受到了审查,以确保没有任何有关华工运输的消息被泄露出去。^②1917年2月,“因为怀疑某些华人会被敌特人员利用充当消息传播媒介”^③,钱伯斯命令加拿大电报公司(*Canadian telegraph companies*)“密切监视”那些居住在加拿大的华人的电报往来。尽管大部分工作人员都遵守钱伯斯

① John Hughes, Inspector General of Western Canada, memo to adjutant-general, militia headquarters, Ottawa, September 17, 1917, NA, Canada, RG 24/2553, HQC 2115.

② Dominion Immigration Inspector for B.C. to Chambers, May 1, 1917, NA, Canada, RG 6-E, T 101.

③ Chief Press Censor for Canada to Hulatt, Confidential, February 28, 1917, NA, Canada, RG 6-E, 168, part 2.

对待他们,没有为将来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埋下种族仇恨的种子。然而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如果你对他们太好了,他们就会利用你的善心”。^①虽然很少,但也还有一些英国军官能够友好、体贴地善待华工。正如华工恨透了那些虐待他们的军官,同样他们从来都毫不犹豫地对那些友善的军官表示感激。考克(F.S. Corke)看起来就是他们喜欢的一名军官。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属下的华工专门写了一封信表达他们对他的公正和友好的感激之情,对他要奔赴前线表示遗憾(他不久之后死于战场)。^②科马克(G.E.Cormack)也写道,当他的华工团在加拿大时,他在医院照顾过一名刚做完大手术的华工。之后这名华工送给他一块刻有两只动物打斗嬉戏图案的木板雕刻。这名华工通过这种方式对他的特别照顾表达了感激之情。^③

118

除了任命这些为数不多的友善军官外,英国远征军也对华工采取过一些友善的行动。至少在华工死后,英国人尽量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如果华工死在欧洲,中国人希望他们的遗体能被运回中国:“如果不是葬在中国,他们就不能进天堂。”^④1917年12月21日,陆军准将勒德洛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一天早上他派人去埋葬一位华工的遗体。“中国人对此表示抗议,他们希望他的遗体能被运回中国,但是我很遗憾我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⑤不过英国人确实为中国人提供了体面的葬礼和墓地,每位死者都有单独的棺材和墓穴。除了明确规定需要回收的,任何盒子或包装箱都会被用作这一用途。英国人还在法国的诺耶勒斯(Noyelles)为中国人修建了一座风景秀丽的陵园。^⑥中国人可以自由地选择陵园中墓穴的位置。在陵园北面和西面的不远处是一片树林,根据中国人的观念,这里的“风水”很好。每个葬礼都会有当天值日的卫生官参加。棺木上覆盖着英国国旗,并由处在康复中的病人抬着。在墓地会举行一个简短的中文追悼仪式。立在墓穴顶端的巨大白色十字架上刻着死者的姓名和编号。1917年10月29日,一名军官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看见3名中国人被葬在中国人墓地,他们的棺材上覆盖着英国国旗”。^⑦

① Captain A.McCormick files: typed draft memoir, IWM 02/611, 210.

② F.W.Corke was the commanding officer of the No.41 Chinese labor company. F.W.Corke file: Chinese labor corps, LC, Leeds, GS 0366.

③ G.E.Cormack files: “War Times in Russia,” typed memoir, IWM 92/21/1, 19.

④ Brigadier General W.R.Ludlow Diary, entry of September 29, 1917, LC, Leeds, GS 0984.

⑤ 同上书,1917年12月21日。

⑥ General routine orders, no.200, General Headquarters, August 28, 1918, NA, Canada, RG 24/1833, G.A Q, 8—36.

⑦ W.A.Dent Diary, entry of October 29, 1917, LC, Leeds, GS 0453.

工在一起并肩工作的包括希腊人、葡萄牙人、越南人、西班牙人、摩洛哥人,等等。尽管语言不通,但华工与这些劳工同伴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尤其是与法国的工友。华工们开怀的笑容和善良的本性,再加上挂在嘴边的诸如“很棒”,“太好了!”和“还好吗?”这样耳熟能详的短句,为他们赢得了很多朋友。他们对待朋友非常慷慨,他们会用红葡萄酒、白葡萄酒、黑咖啡和香烟招待他们的朋友,这些东西在战时都是非常珍贵的,这些朋友也随时会在需要的时候给予华工以热情的回报。^①凯瑟琳·夏洛特·博顿利(Kathleen Charlotte Bottomley)是在法国的英国妇女辅助兵团的一名接线生。她还记得当她随团驻扎在华工营地附近时,华工曾送布丁给她吃。^②尽管总的来说华工待人很友善,但他们似乎是天生的种族主义者,因为他们不理解世界上还有其他不同的种族。他们无知地认为,只有坏人的皮肤才是黑色的。他们不懂为什么有些人的皮肤是黑色的。华工和阿拉伯人也合不来;他们之间经常打架。^③在一家法国工厂里,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同在一起工作。他们相处得不好,1917年5月下旬他们之间发生了群殴。三名阿拉伯人被打死,十二名华工受伤。为阻止矛盾升级,法国政府随即将阿拉伯人迁往别处。^④华工尤其不喜欢摩洛哥人,称他们为“黑鬼”。^⑤总的来说他们与非洲劳工难以相处只是因为皮肤颜色的问题。^⑥李骏在给中国政府的报告中提到,非洲黑人与中国人打架经常会死人。但华工与他们的亚洲伙伴越南工友的关系则很密切。根据李骏的报告,不论什么时候华工与非洲劳工打起来,越南劳工都会加入到华工一边一起打非洲劳工。由于越南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政府不希望越南劳工受到中国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费尽心思把华工和越南劳工分开。^⑦

142

出于沟通上的误解以及西方人种族歧视的原因,华工与西方劳工之间有时也会发生打斗。比利时牧师阿谢尔·范·瓦勒格汉姆(Achiel Van Wallegem)在1917年圣诞节所写的日记中提到:“今年的圣诞节格外吵闹,一片乱哄哄。尤其是新西兰人不断地灌酒,喝醉了便跌跌撞撞,大喊大叫,一个劲地寻衅滋事,专门找中国人的麻烦。中国人被激怒了,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到了下午和

① I.H.Shi, "With Chinese Laborers," 447—452.

② Kathleen Charlotte Bottomley, interview, IWM Sound Archives Catalogue.

③ 《华工杂志》,1918年7月25日,第24期,第23页。《华工杂志》,1918年6月25日,第23期,第19页。

④ 《华工杂志》,1918年6月25日,第23期,第19页。

⑤ I.H.Shi, "With the Chinese Laborers," 449—450.

⑥ 马崇干:《华工在法之情形》,《粤汉声》,1918年11月,第8期,第13页。

⑦ 《欧战华工史料》,第380—381页。

由于朋友的工资被算错了而与出纳员发生纠纷,他要求对方立即改正错误。可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意见不一致,或许也因为张长松的语言能力有限,冲突很快升级,张长松拽着可怜的法国出纳员来到了上级的办公室。张长松的行动给一位 16 岁的法国姑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这一幕发生时,这个姑娘正在打扫办公室。她因这件事爱上了张长松,他们走到了一起,最终一起生养了 13 个孩子,结婚 60 多年后仍然过着幸福的婚姻生活。^①

显而易见的是,法国男人不愿意看到本国妇女嫁给中国人。1917 年 5 月来自哈维尔地区的一份警察报告显示,当地的一些法国人不愿意看到中国人待在本国,甚至聚集起来对当地的华工表示抗议。根据这份报告,法国人对他们国家所遭受的高战争伤亡率感到沮丧。“(在生产军需品的工厂里)时常流传着一种说法,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指法军继续伤亡),法国就没有男人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打仗呢?这样下去,其结果只会使中国人、阿拉伯人和西班牙人娶走我们的妻子和女儿,并瓜分我们迟早要在前线为之献身的法国领土。”^②这种焦虑使得中国人和当地人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看来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因为它引起了法国政府的注意,并致使内政部专门为此发出通告,阻止法国妇女和华工结婚。通告宣称,华工缺乏经济实力,中法生活习惯不同,许多人在来到法国之前可能已经结婚,劝告法国妇女在嫁给华工时要特别小心。甚至连中国政府也对此表示关注,要求华工慎重考虑跨种族婚姻。中国外交官顾维钧告知法国政府,中国政府可代负相当责任,会确保准备迎娶法国姑娘的华工都是单身。中法婚姻问题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中国重要的教育家李石曾附和当时正流行的种族优劣论,争辩说跨种族婚姻对中华文明大有裨益,因为跨国婚姻可以为中国创造出更优秀的人种。“略谓吾人极端赞成中法或中欧美人之联婚,盖人类进化之途径,人种调和亦其最要者。”^③另一个中国人认为,法国政府对想要嫁给华工的法国妇女提出警告是可以理解的。但他认为法国军方“矫枉过正”,把已经与法国妇女结婚或者订婚的华工遣送回国,简直是“侵犯了他们的人权”。^④

遗憾的是,我们可能永远无法了解那些中国人与法国人婚姻的全部真实情

① 关于张长松的故事,可参考:Christian Tchang,“Papa Etait Chinois, Maman Berrichonne”。此为私人收藏的未出版的家庭故事及相片集。

② John Horne,“Immigrant Workers in France during World War I,”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4, no.1(1985):85.

③ 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81 年版,第 243 页。

④ 《旅欧周刊》,1919 年 12 月 6 日,第 3 页。

况,因为当时法国政府删除了任何提及中法爱情的新闻报道。^①尽管资料并不完全,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定,战后大约有 3 000 名华工选择留在法国,其中有许多人同法国妇女结婚。另外据一位比利时学者称,佛兰芒(比利时两个民族之一)妇女似乎也与华工有过两性关系。尽管证明资料非常有限,但这样的事情一定发生过。^②

① 《报载旅法华工状况之事实》,《华工杂志》,1918 年 12 月 25 日,第 29 期,第 15—16 页。

② Dominiek Dendooven, "Living Apart Together." 8.

条款规定。直到1918年3月9日,他终于提出要一份合同协议的副本。他在给约翰·普赖斯·杰克逊的信中写道:

我想问一些似乎这里的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如果存在着同样情况的记录的话,那么提出这些问题就更为必要。首先,关于我们要遵循的关于华工的合同,您有多余的副本吗?我想要一份以便保证在履行职责时我所做的都合乎要求。其次,万一合同中没有就一些重要的事情作出规定,您能给我多大的权限去处理以下问题:如果法国政府向华工发放酬金,您希望我为将来之需把华工的工作时间表留底吗?如果合同对华工生病或负伤是因公还是因私有所规定,那么区分界限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有人生病卧床,他还能拿工资吗?如果有人出了意外,比如伤了手指,在他因手指的伤无法工作的整个休养期间内,应该给他付全额工资吗?关于这些问题,合同上有没有规定,还是这都仅仅是我们的猜测?另外当一名华工已经丧失劳动能力,比如有一个得了严重的淋病的人之特例,您有权把他调离吗?还是说只能任他成为美军的累赘?①

我们从这封信中可以了解到,由于指挥官在华工团的管理上没有明确的指导方针和措施,情况有多么混乱。加之指挥官本身不具备管理能力,美国人手下的华工团事务大多运转不顺畅就是自然的事了。

总的来说,美国人对同法国政府签订的有关华工事务的协议持保留态度。美国陆军少校罗伯特·贝茨(Robert J. Bates)向上级报告说,华工营的法国人是多余的,华工应该由美国军官全权管理。他向上级反映,如果没有法国人,“事实上我相信我会把华工管理得更好”。“既然华工团是由美国人组织和指挥的,也是我们在付工钱,那么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他们实行全权管理。但是只要有法国兵在场,这就无法做到,因为他们和两边都不断产生矛盾。我恭请所有的法国军官和士官们尽早离开我们的驻地。”贝茨指出:“我知道,中法政府之间签订的协议规定了法国政府必须为华工配置这些士兵以担起管理的责任。不过,为了大家都好,最好取消这一规定。”②一名叫格林伍德(J. B. Greenwood)的美国军官表

① William Kaufman to John Price Jackson, March 9, 1918, NA, RG 120, entry 1758, box 111, folder 68.

② Robert Bates to Labor Bureau, April 19, 1918, NA, RG 120, entry 1758, box 112, folder: 113 Major Bates.

劳工教育最有效的工具之一,是晏阳初于1919年1月15日在巴黎创办的《华工周报》。在它的巅峰时期,《华工周报》销售量高达15 000份。作为该刊主编,晏阳初一直工作到1919年6月返回美国的时候。随后由毕业于密苏里大学的傅若愚(Fu Ruoyu)继任主编,傅若愚一直工作到1919年11月返回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更高的学位。陆士寅(Lu Shiyin)在这之后接替了他的位置。晏阳初这样介绍这本杂志的诞生过程:他晚上的时间都是用来指导华工班和给华工上课。然而每当下课之后以及在晚餐的时间,华工们都不断地来找他,向他询问每天的新闻。华工们为了明白自身周围所发生的一切的意义,如此热切地想要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望深深地打动了晏阳初,于是他用大量的时间给他们讲述英国和法国报纸上的新闻。他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能有一份简短的新闻简报,用华工们自己能懂的语言(中文)印出来,在他们中间发行,他们就会了解在凡尔赛、伦敦、华盛顿以及中国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了。这其实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可是对于华工们来说却意义重大。于是,《华工周报》这份刊物就这样诞生了。^①

《华工周报》的创办是为了“开通华工的知识,辅助华工的道德,联络华工的感情”。它注重开阔华工的思想境界,加强他们的国家、民族认同感及激发爱国热情。每期周报内容一般包括编辑论说、祖国消息、欧美近闻、华工近况等。在讨论国家主权的时候,它呼吁华工捍卫国家利益。^②周刊反复劝诫华工们不要骂人、不相互打斗、不赌博、不偷窃、不嫖妓。^③晏阳初和他的朋友们殚精竭虑,努力帮助华工培养自尊自爱、爱国爱家的情操。晏阳初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中国人”由于中国数千年以来的固执守旧,不愿意离开故土外出旅行谋生,所以他赞扬华工们奔赴法国的冒险精神。他向华工们表达了他的愿望,希望他们“不但自己增广见闻,并且可以期满回国,兴家立业,强种强族”。他要求华工们努力工作,以他们的勤劳刻苦,“不特是同你们自己顾脸,也是为我们祖国争光”。晏阳初要求他们要把思身、思家、思国放在首位,考虑回国后应该做什么,如何兴家爱国。他劝告华工努力学习新知,谨慎行事,破除积习,把自私自利的烂心割除,换一个公心,共创新社会、新中国。他提醒他们,他们在法国的行为举止,直接同外国人对中国人以及中国这个国家的看法联系在一起。“你们住在法国,就算是中国全国全族的代表”,所以为了中国和中国人的利益,“你们在外国作为行事,岂

207

① “Red Triangle Overseas,” Paris, February 2, 1919, YMCA Archives, Biographical records, James Yen, box 233.

② 《中国的主权》,《华工周报》,1919年2月12日,第1页。

③ 《华工当顾国体》,《华工周报》,1919年2月5日,第1页。

康、教育、体育等众多项目活动中最卓越的工作”。^①但是晏阳初在中国的活动很快就超出了基督教青年会的范畴。^②他在1923年离开了基督教青年会之后,从未允许他的组织被视作是基督教性质的团体,而且事实上,有一段时间他宁愿人们不用基督徒来称呼他,因为这样称呼意味着他是一名从属于外国教会的成员。而他更愿意把自己称作“基督的追随者”,以表明他作为信徒同耶稣之间的直接关系。^③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甚至还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许多国家遵循的榜样。1930年代,在美国教育部长雷·莱曼·威尔伯(Ray Lyman Wilbur)宣布美国政府将开展一场大众扫盲运动时,他补充道,这一计划与晏阳初在中国的项目是相类似的。《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称晏阳初的平民读写教学方法可以成为“美国最明显的学习楷模”。^④不久后,国联要求晏阳初开始在全世界推广他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在国际化的视野下,晏阳初的计划则变为“除天下文盲,做世界新民”。1943年,晏阳初被评为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10个人之一,同时入选的人还有亨利·福特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212

更为重要的是,晏阳初在中国精英阶层中还有许多志同道合的追随者。正如北京的一份英文报纸提到的:“这是迄今为止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走入乡村的最值得铭记的‘出埃及记’。旧帝国的翰林、国立大学的教授、大学的校长,前国会议员,以及在美国一流大学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的年轻人,放弃了他们的职位,离开了城市里舒适的生活,来到定县(即平民教育试点县)这样的落后偏远地区,寻找唤醒这个古老的民族从落后的生活中新生的办法,从底层向上构建一个民主的社会。”^⑤晏阳初极受欢迎的平民教育运动与晚清提倡文体简化和普及教育有着多方面的联系。^⑥胡适等人于1917年开展的白话文运动,必定对晏阳初的思想和方法产生了影响。新文化运动中的爱国主义和大众化主张在五四运动中获得了更广泛的接受。晏阳初的识字运动得到了胡适、蔡元培、梁启超、陶行

① Hopkins, *History of the Y.M.C.A. in North America*, 695.

② Frank Ritchie to A.W.Hanson, July 17, 1929, YMCA Archives, Biographical records: James Yen, box 233.

③ Hayford, *To the People*, xii, 52.

④ Nathaniel Peffer, “Yale’s Yen Charts a Course for China,”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February 1, 1931), 7.

⑤ “The Chinese Mass Education Movement—an Outline” (typed document with no author and date, page 2), Columbia University,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IIRR Collection, box 1, articles on the program.

⑥ Paul Bailey, “Popular Education Developments, 1904—11,” and “Popular Education Developments in the Early Republic,” in his *Reform the People: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s Popular Education Early 20th Century China*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0).

一平等待遇,因为“吾国参战之功,为工人最大”。^①许多在法国的中国人也同意他的看法。一名华工指出,华工在世界上之所以总是被歧视,就是因为中国太弱而不能保护自己的国民。他呼吁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向其他国家提出终止对中国人的歧视的要求,并像对待其他国家公民一样平等地对待中国人。“这对华工和中国都有好处。”^②蔡元培也建议,此次大战,“我国为参战之员,若供给原料,输送华工,皆我参战所尽之义务。故中国在国际上亦应该处平等地位”。^③

1920年,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陈独秀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鼓励工人要成为管理者而非被管理的人。^④陈独秀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都强调中国应该更重视民众教育而非精英教育。只有针对民众的教育才能培养出有用的人民。^⑤在他的文章《华工》中,陈独秀写道:“英国人自夸说,无论太阳走到何处,都照着英国国旗,我们也可以自夸说,无论太阳走到何处,都照着中国人做工。”他进一步评论道,虽然许多中国政治家认为中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作出了很多贡献,但真正切实的贡献是由那些到欧洲去的华工作出的。^⑥陈独秀也像其他许多中国精英一样,相信“劳工神圣”。他在一篇题为《劳工神圣与罢工》的短文中指出,由于工人是神圣的,雇主必须给予他们良好的待遇。否则,他们有权利罢工以要求更好的待遇。^⑦

因而,当晏阳初断言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取得的任何胜利,都与中国外交官的外交技巧无关,“不是外交家的辞令换来的”,而是“被中国人轻视、被外国人践踏的苦力争来的”,就不令人奇怪了。^⑧即使到了1930年代,一位笔名白蕉的作者仍然坚持,中国所谓参战,“而实际有功,足为国家稍争体面者,阙为华工”。^⑨

1919年,抵制巴黎和会有关山东问题决议的游行示威活动触发了波及广泛、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标志着数个历史上的第一次。这场由学生所领导的运动是中国大众第一次公开提出他们关于政治、社会、外交变革诉求的运动。或许是由于老师和学生的角色置换,运动中所形成的另一个新趋势是:工

① 康有为:《致陆子欣书》,《晨报》,1919年1月9日,第3版。

② 一华工:《华工与和平会议》,《华工杂志》,1919年1月25日,第30期,第5页。

③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88页。

④ 陈独秀:《独秀文存》(第1卷),第449—452页。

⑤ 陈独秀:《独秀文存》(第2卷),第657页。

⑥ 同上书,第103页。

⑦ 同上书,第104—105页。

⑧ 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2卷),第257页。

⑨ 白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国参战》,《人文月刊》,1936年2月15日,第1期。

他们将成为改革的中坚分子。萧子升和毛泽东的密友蔡和森于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萧子升计划动员一万名在法华工加入毛泽东的政治组织新民学会,作为改造中国的坚实基础。当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兴奋,他写信告诉萧子升:“吾等正奠下(中国)改革的基石!弟当努力于长沙之扩展运动,惟目前兄等在法似乎较易进行。”难怪中国后来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计划依靠在法华工来推动中国的革命运动,而在法华工也确实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

勤工俭学运动持续了不到三年的时间。第一批勤工俭学生人数比较多,他们于1919年5月前往法国,最后一批人于1920年年底赴法。后来,因为缺乏经费和组织,勤工俭学运动停办。但是从1919年到1920年年底,总计近1600名中国学生和有职业者前往法国加入了这一运动。^①可以这样说,许多后来成为中国革命领袖的人,实际上都曾经追寻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华工的脚步。

219 华工在法国期间正值勤工俭学运动在法开展,当前来勤工俭学的学生们就运动的方向和内容产生严重的矛盾分歧时,华工们感到非常不安。一名劳工要求勤工俭学生要有同劳工团结一致的精神,指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在体力劳动中弄脏自己”。他批评道:“啊,工读学生!你们说政府像海盗,我们也觉得它是窃贼。然而,如果你们也寻求政府的资助,那么你们是不是也分到了一份赃物?”^②华工们常常与工读学生就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展开激烈的辩论,^③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旅欧支部也在努力吸收华工加入。^④饶有意味的是,当中国精英想要在里昂为工读学生建立一所中文大学时,是华工们志愿提供了急需的帮助。^⑤

在法华工是“勤工俭学运动的重要先声”。这场运动“后来为20年代早期法国华人团体内部的大辩论提供了争论的关键议题。并且以勤工俭学运动为中心,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得到了进一步发展”。^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第一次有如此众多的普通中国人与西方产生了直接接触。毋庸置疑,这一经历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观察和体验西方文明的机会,而且也为他们反思中国人自

① 详见裘实:《留法勤工俭学的历史作用》,《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1期,第42—46页。

② 无名华工:《勤工俭学该求自助呀!》,《旅欧周刊》,1921年4月12日,第70期,第3—4页。

③ Levine, *Found Generation*, 113.

④ 同上书,第205页。

⑤ 《旅欧新闻》,《旅欧周刊》,1920年5月15日,第3页。

⑥ Levine, *Found Generation*, 71.

战争的全局有多么重要。劳工团仍然是一个新鲜事物,以至于它在正规军体制中还没有确立起自己的地位。^①

基督教青年会的报道指出,中国人到法国来所能达到的军事目的才是协约国考虑的决定性因素。这些国家通过控制海上通道,通过人们对于协约国正在进行的战争的广泛同情,为将可使用的人力提供给协约国作了最大限度的投入。^②华工们年轻力壮,他们的到来帮助了协约国,使其战斗力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一战期间的英国陆军大臣和首相劳合·乔治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写道,他们(指华工)“个个强壮如牛,你会吃惊地发现有些华工夹起重达三四百磅的一大块木材或一捆铁皮卷仍能健步如飞,好像这些重物轻如普通的石块一般!”^③ 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认为,美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贡献不在军事上,“美国的参战并不能立即改变交战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美国的主要贡献在于经济方面:美国参战使得协约国在作战时不必担心“国内经济会有破产之虞”。^④我所要指出的是,中国对一战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所提供的人力:由于有了14万名华工分布在前线、后方,中国人极大地巩固了协约国的防线,并为军需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

229

由于华工的巨大牺牲和贡献,以及随后人们对他们的遗忘,中国学者陈三井将华工被送到欧洲的遭遇称为“人类历史之一大悲剧”。^⑤然而,如果我们将华工计划视作中国参战计划重要的一部分,那么这样看来,它所取得的结果仍然是意义深远的。即使中国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但是仍然与协约国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中国坚定地发出信号,表达出参与世界事务的愿望,显示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能力,并获得了世界其他国家哪怕是勉强的承认。《远东评论》杂志(*Far Eastern Review*)在1918年预测说,来自山东的华工将以其在欧洲战争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而在历史上留下应有的地位。“在这场战争以前,东方还从未有机会给西方在任何方面提供过如此巨大规模的人力支援。它曾经数次与西方对抗,迫使西方数次联合起来,以不同方式为欧洲社会和思想辩护。但是它作为整体在过去从来没有在欧洲的巨大冲突之间选择立场。”^⑥但是华工的真正贡献远

① “An Army of Labour: Behind the Lines in France,” *Times* (London), December 26, 1917, 8.

②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Summary of World War Work of the American YMCA*, 59.

③ David Lloyd George, *War Memoirs of David Lloyd George* (London: Odhams Press, 1942), 2:800.

④ Paul Kennedy,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Syste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 no.1 (Summer 1984):24.

⑤ 陈三井:《华工与欧战》,前言,第1页。

⑥ *Far Eastern Review* 15, no.4(1918):126—127.

的援助。法国人民应该牢记这一事实。但实际上却很少有人还记得中国人的真诚援助^①。事实上,从华工被雇用的那天起,法国人和英国人就没有对他们以诚相待。法国人和英国人向华工许诺他们不会被派往前线,然而,大量的华工恰恰因为在前线战场附近工作而死于敌人可怕的炮火和轰炸。华工的合同中并没有一条规定他们要受军队管制,然而他们得到的和要忍受的正是军队的管束和严厉的军纪。华工被承诺会获得优厚的收入,但是,当他们被遣返回国时,由于战后的通货膨胀,1 法郎只相当于 0.35 中国银元。而当大多数人最终回到中国时,1 法郎的汇率更是跌至 0.07 银元。当时一个普通劳工在青岛都能有 0.3 银元到 0.4 银元的日薪^②。这意味着,由于法郎和中国银元之间的汇率大幅下跌,欧洲人给华工的所谓高薪,与在中国工作的劳工薪水相比没有丝毫优势。换句话说,这些华工远涉重洋冒着生命危险所担负的工作,甚至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好处。

由于华工的苦难遭遇,加之他们的贡献不被人们所认可,所以中国学者陈三井将他们的旅程称为“人类历史之一大悲剧”^③。马利林·列文(Marilyn A. Levine)称这些中国劳工“没有完成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预期目标”^④。朱迪思·布力克(Judith Blick)声称中国派遣劳工赴法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商业创意,中国与欧洲的大战争毫不相干也相距甚远^⑤。但是,这些狭隘的看法都未免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嫌。从商业角度来看,惠民公司并没有真正得到任何收益,它在 1921 年解散时几乎破产,有资料显示,梁士诒本人就损失了 15 万元^⑥。然而,如果我们从中国寻求国际化和新的民族认同的角度来看“以工代兵”的策略,这些华工的旅程则有着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肯定,这些中国劳工不但为战争作出了宝贵贡献,他们也对战后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对合约的拒签以及后来中国的发展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与其说华工赴欧是一个“悲剧”,不如说他们的旅程实际上是一个成功的故事,至少在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方面,中国在战后世界格局中为中国及其人民寻求平等地位方面,华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华工的成功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没有人给予他们应有

① Marius Moutet, “Preface,” in P. Wou, *Les Travailleurs Chinois et la Grande Guerre* (Paris: Editions A. Pedone, 1939), 7.

② War Office representative G. S. Moss, Report on the demob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labor corps, October 31, 1920, NA, Kew, FO 228/2895.

③ 陈三井:《华工与欧战》,第 1 页。

④ Levine, *Found Generation*, 71.

⑤ Blick, “Chinese Labor Corps in World War I,” 112.

⑥ 李吉奎:《梁士诒》,第 227 页。